【综合研究】

# “自古文人多入蜀”：一种文学地理观念的生成

葛永海　沈　闻

【摘　　要】“自古文人多入蜀”。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长时段、大规模的文人入蜀现象，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入蜀”吟咏。这些吟咏经过历代的累积、沉淀、感悟，文人与蜀地的内在精神联系不断被强调和揭示，逐渐形成了为世人所认可的“自古文人多入蜀”观念，其要旨在于入蜀之行对于文人创作的山水熏染和精神引领，同时强调了时代的连续性和文人群体参与的广泛性，这一观念形成的背后是一个内外多重因素相互协调的动力机制。“文人多入蜀”作为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地理观念，为文学地理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富有启示的阐释框架和学术路径。

【关 键 词】“自古文人多入蜀”；文学地理观念；生成机制

【作者简介】葛永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方志文化研究与传承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浙江 金华 321004）；沈闻，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浙江 杭州 310009）。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24.6.132～146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游士叙事视角下的明清小说地图研究”（19AZW014）的阶段性成果。

在全国范围内，文学兴盛区域不知凡几，文人跨区域流动亦普遍发生。而文人入蜀现象似乎最为世人所关注，历代都有“入蜀”的吟咏，从南北朝庾信的“峻岭拂阳乌，长城连蜀都”，鲍照的“蜀汉多奇山，仰望与云平”，到唐代韩愈的“蜀雄李杜拔”，刘沧的“北去西游春未半，蜀山云雪入诗情”，再经宋元明文人的感怀吟咏、凝练总结，文人与蜀地的内在精神联系被强调和揭示，逐渐形成了内涵较为稳定的“自古文人多入蜀”之说，至清代则有诗人林良铨《题孙受亭司马闲情集后》的“自古文人多入蜀，西风又近杜陵秋”，李调元《送朱子颖孝纯之蜀作宰》的“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毕沅《集梦堂司农独往园为查俭堂太守题蜀图即送之官宁远》的“自古诗人都入蜀，于今良会正中秋”等彼此呼应的集中吟咏。“文人入蜀”吟咏由客观陈述逐渐变为一种价值判断，遂形成了以全时代覆盖为背景、特定地域对于文人群体的山水浸染和精神引领为内核的完整观念，得以广泛流传。

蜀地文学在历史上的多个朝代都对全国文学保持着较强的影响力，文脉不曾断绝。从学术来看，蜀地自文翁化蜀设立官学，便成为有文教传统的地区，蜀学经历先秦、西汉、宋代、清末四次繁荣，延泽至近现代，具备完整且辐射全国的文教传统。这种影响力更表现在才华超绝的本土文人传承上，如司马相如之于汉大赋、扬雄之于都邑赋、李白之于唐诗、苏轼之于宋诗文，他们不只是地方性文豪，更是辐射“一代之文学”的时代巨擘。蜀地文学还形成了独立且成系统的文学作品体系。从文体上看，除纯文学作品外，更拥有《成都文类》《全蜀艺文志》《蜀中广记》等目录学、文献学性质的著作；从文学史意义来看，蜀地是文学变革之地，吹响了盛唐诗复古的号角，孕育了历史上最早的文学流派“花间派”，推动了词体的流行及竹枝词体的文学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蜀地文学不仅依靠蜀籍文人维系，更仰仗历代入

蜀文人的开拓与发扬。蜀地先后接纳了初唐四杰、杜甫、韦庄、陆游、杨思圣、吴昇、汪初等历代诗人的探访，并见证了他们的文风转变。这片地域与外来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主客交互，文泽广被，影响深远。

“文人入蜀”具有典型意义，一方面是它所依托的蜀地文学本身的典范意义，蜀地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且不囿于一郡一县，影响力范围遍及全国，具有全局性与持续性。另一方面则是文人跨区域流动的典范性，历代文人在大规模的入蜀、出蜀之间，其文学创作及文学观念的影响逐渐波及全国。通过对“文人入蜀”的考察，我们将会对文学地理学视野中的文人籍贯、文人流动、文学传播等问题获得新的理解。

就研究现状而言，“文人多入蜀”吟咏的演变与观念生成的机制尚未被学界充分关注，因此，实有深入研究之必要。[①]我们将主要讨论以下问题：关于“文人入蜀”的吟咏是如何发展演变的；这些吟咏背后的观念在何时定型；背后的动力机制又是如何。一言以蔽之，“自古文人多入蜀”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学地理观念，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 一、清前文人入蜀与“文人入蜀”吟咏的演变

与其他区域的大规模文人流动一样，整体而言，“入蜀”并非某个文人简单个人意愿所致，而是一代又一代文人群体被时代潮流与文化观念裹挟的结果。这些文人所能真正掌握的唯有个人意愿和时代机遇。不同时代的入蜀呈现不同的特点，由此投射为不同的蜀地认知，不同时代的“入蜀”吟咏正是在这些文人的客观行动与主观创作中寻求平衡、构建而成。可以说，“入蜀”吟咏是亲历者和后来者对前代文人不断观察借鉴、凝练总结的结果。

### (一)唐前文人入蜀与“入蜀”吟咏的文化前提

先秦时期的蜀地并非文学沃土。秦灭蜀之前，蜀地相对封闭，且神秘化倾向较重。自春秋入战国后，《史记·秦本纪》载：“(秦)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郑”[②]；又载“(惠文君)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一年……公子通封于蜀”[③]。蜀地归入秦统治范围后，则“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④]。蜀地长期以来因其相对孤立的地理条件而作为罪人流放的处所，其中也有文人，如《汉书·艺文志》：“(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⑤]，其中的尸佼算是较早入蜀的文人，他在蜀地撰写《尸子》，“造书二十篇，凡六万余言”[⑥]，也算有文学活动。但一方面此时期的文人流动极少，“入蜀”行为不成规模，并未形成现象；另一方面当时蜀中文学几近荒芜，文人入蜀后，难以体现出创作受地域影响而有所变化的倾向。

蜀地直到汉初，仍处于文教不兴、儒学不传的相对独立状态，直至景帝朝文翁入蜀，加强了蜀地与中原的学术文化交流，[⑦]蜀文学方后来居上，在汉代达成第一个高峰，蜀地文人及入蜀文人对文翁化蜀多有赞誉感怀，这大致可以认定为蜀地文教兴起的第一个历史节点，也是后世文人“入蜀”行为及对应“入蜀”吟咏萌发的基础。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司马相如出蜀时。司马相如是蜀地第一个影响力遍及全国、延泽后世的一流文人，对于蜀地及全国有着重大影响。对内而言，司马相如进一步带动了蜀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对此多有论述。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着重说明了文翁与司马相如对蜀中文学发展的意义：

> 巴、蜀、广汉本南夷……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⑧]

班固并非蜀人，又是史家，他关于蜀地文脉的阐述基本可以看作东汉主流文学界对蜀地的认知。

此后的苏轼在《谢范舍人书》中亦有云：

> 文章之风，惟汉为盛，为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驹马，徜徉乎乡间之中，而蜀人始有为文之意，弦歌之声，与邹、鲁比。[⑨]

对外而言，汉代以来以司马相如为首的蜀中文人改变了当世文人对蜀地的认知，与文翁一起，成为蜀地“好文雅”的源头与象征。蜀地在入蜀者眼中不再只是“其地四塞，山川重阻”的险境，而逐渐具备了一定的吸引力。

此后，东汉末荆楚一带士人百姓避难入蜀，季汉士人随刘备入蜀，西晋末年流民入蜀，[⑩]汉唐之间的连年动乱客观上形成了包括文人在内的难民入蜀避

祸传统。蜀地凭借山川之险,天府沃野,自成格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文人入蜀避祸的选择;汉末、魏晋文人入蜀,则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蜀文学,尤其扩充了蜀地史学传统及人文历史素材,有利于后世蜀地创作。

至南北朝时期,诗歌中出现了不多的"入蜀"吟咏,可为代表的是南北朝的庾信和鲍照两位名家,庾信《别庾七入蜀诗》:"峻岭拂阳乌,长城连蜀都。石铭悬剑壁,沙洲聚阵图。"鲍照《拟古诗八首》其八:"蜀汉多奇山,仰望与云平。阴崖积夏雪,阳谷散秋荣。朝朝见云归,夜夜闻猿鸣。忧人本自悲,孤客易伤情。"主要表达的还是蜀地的僻远之悲情。

不得不承认,汉魏六朝巴蜀文学发育状况相对全国而言极为薄弱,本土文人力量尤其单薄,虽然得到入蜀文人的文学补充,依然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弱势,远逊于中原、江南文学。[11]这一现象将在唐代发生剧变。

(二)唐代文人入蜀与"入蜀"吟咏的萌发

唐代文人入蜀行为,对于"入蜀"吟咏的形成意义重大,如果没有唐代文人大量入蜀的具体行动,"入蜀"吟咏将难以维系。从学术研究层面看,对于唐代文人入蜀的相关研究也最为充分。

其实,唐代蜀籍文学家的绝对数量并不多,曾大兴曾依据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制作《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简表》,[12]隋唐五代蜀籍文学家数量在全国范围内仅排名第十,在全国文人中占比不到5%。然而,据严正道在其著作《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文化研究》中的统计,《巴蜀文学史》附录共录唐五代蜀籍文人18人,入蜀文人196人,[13]可以说,唐五代蜀中文学的基本面乃由外来文人支撑起来。

《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文化研究》一共考证并记录入蜀诗人196人,入蜀诗2177首(含残句),分9个时间段,4个涨落周期。[14]唐代入蜀文人不仅在蜀地著述颇丰,而且构造了体裁空前完备、内容空前丰富的文学创作体系,这一特征在后世入蜀文学中亦有所沿袭。

从体裁上看,"入蜀"文学囊括了诗词、笔记、小说、史籍、方志、行记,甚至含有说明文性质的各类碑记题铭。其中行记类作品,包括入蜀纪行诗文在内,由于综合了风物吟咏、人物抒情、旅行文化、差旅习俗等诸多内容,近年来也逐渐被学界纳入研究范畴。从内容上看,"入蜀"文学内容上以山水纪行、交游酬唱等为主,而又有所发散和超越。哪怕在山水诗这样的传统领域,"入蜀诗"也因其独特的目标景物、复杂的心理状态、纪实的行文风格而在王孟开创的虚化山水之外另辟新境。[15]

初唐时,文人提及蜀地,大多将蜀地排斥于中原文化之外,视如蛮夷;文人入蜀之时,又常陷入恐慌与不适应,畏惧蜀道艰险、气候怪异、民风鄙陋。如独孤及所作《招北客文》(一说为岑参所作),将当时文人对于蜀地的不适应乃至抗拒、畏惧表现到极致:

蜀本南夷人也,皆左其衽而椎其髻……二江双注,群山四蔽,其地卑陋,其风脞脆。蛮貊杂处,滇僰为邻;地偏而两仪不正,寒薄而四气不均。花叶再荣,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云。阳景罕开,阴气恒昏,以暑以淫,为瘴为厉……蜀之不可往,北客归去来兮!

在唐代很长时期内,关于蜀地山水之险的吟咏成为主体,比如李白的《送友人入蜀》:"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崔信明《送金竟陵入蜀》:"金门去蜀道,玉垒望长安。岂言千里远,方寻九折难。"李颀《临别送张諲入蜀》:"蜀江流不测,蜀路险难寻。木有相思号,猿多愁苦音。"韩翃《送长史李少府入蜀》:"行行独出故关迟,南望千山无尽期。见舞巴童应暂笑,闻歌蜀道又堪悲。"

在此过程中,随着往来渐多,游览者的感受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些文人已经隐约感受到入蜀对于文学创作的特殊意义,这为"入蜀"吟咏的成型提供了最初步的理论基础。如徐凝《送马向入蜀》:"游子出咸京,巴山万里程。白云连鸟道,青壁遰猿声。雨雪经泥坂,烟花望锦城。工文人共许,应纪蜀中行。"陈标《寄友人》:"杜甫在时贪入蜀,孟郊生处却归秦。如今始会麻姑意,借问山川与后人。"

这种认知在入蜀文人身上更为真切,当然,他们还未达到将自身经历与前代、同时期现象进行比并归纳的程度,而是局限于己身,借刘勰"江山之助"的理论解释自己在蜀地的创作诉求。[16]如王勃《入蜀纪行诗序》:

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长安观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超玄溪,历翠阜,迨弥月

而臻。若乃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登培者,起衡霍之心;游涓浍者,发江湖之思。况乎躬览胜事,足践灵区,烟霞为朝夕之资,风月得林泉之助。

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无情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编为三十首,投诸好事焉。⑰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入蜀文人开启了唐诗"复古"之路,这一文学创作倾向最终与蜀地文人陈子昂实现精神会师,完成了"六朝锦色"犹存的初唐诗向盛唐诗的关键转变。⑱

中唐之后,韩愈在《城南联句》中的诗句"蜀雄李杜拔",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正如钱锺书所言:韩愈的诗句"早把李白、杜甫在四川的居住和他们在诗歌里的造诣联系起来"⑲,这是《入蜀纪行诗序》中"山川感召"观念的延展,它的意义在于不仅落实到具体人物,而且完成了蜀地风格和李杜风格的共同凝练,指出正是"蜀"地之"雄"成就了李杜诗的高拔。

随着玄宗、僖宗两度幸蜀,加之唐末大乱,无数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入蜀,在这一过程中,中原文化也不断与蜀地文化互动,唐人由此"改变了文人长期以来畏惧入蜀的心理"⑳。中唐以后,文人游蜀应该颇为普遍,张籍《弟萧远雪夜同宿》:"数卷新游蜀客诗,长安僻巷得相随。草堂雪夜携琴宿,说是青城馆里时",就写了作者夜读游蜀诗的经历。到了晚唐五代,诗人已开始在作品中赞美蜀地的风光与文学:

凭君游蜀去,细为话幽奇。丧乱嘉陵驿,尘埃贾岛诗。未应过锦府,且合上峨嵋。既逐高科后,东西任所之。(齐己《送吴守明先辈游蜀》)

蜀客才多染不供,卓文醉后开无力。(韦庄《乞彩笺歌》)

可以说,唐代以后"入蜀"吟咏的发展研究,均无法回避唐代文人入蜀奠下的基础。"入蜀"吟咏中多有"自古"二字,若考虑到入蜀行为的规模性与客观上文学创作的繁荣度,当视唐代为真正发端。

(三)宋代文人入蜀与"入蜀"吟咏的奠立

宋代蜀地文学上承唐代文学,又得天时地利人和,是蜀地文学发展的第二大高峰。

所谓"天时",是因为宋代的蜀文学,经历有唐一代浸润,可谓文脉丰盈;所谓"地利",一来源于宋代国土相对狭仄,而且连年收缩。迫于形势,有宋以来"重内而轻外""重文而轻武",㉑中央政府进一步加深对蜀地战略上的倚仗,不仅加速了蜀地经济发展,宋代文学的高度繁荣更催生了"蜀学",将蜀地文学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二来则受益于唐代以来日渐完善的入蜀交通状况,㉒宋人出入蜀,比以往更为便捷,客观上便利了蜀地与外界的交流。

所谓"人和",体现为宋代蜀籍文人数量的增多。五代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恢复文教,大兴印刷,促成了蜀中印刷出版业的繁荣,间接推动了蜀地文学的发展;晚唐五代大量文人移民入蜀,到宋代皆变为"蜀籍文人",在元代费著所撰的《成都氏族谱》中,唐代迁徙入蜀的大家族达到28家,在蜀中知名文学世家中占比过半;其他入蜀杂家百工,则推进了巴蜀文化的繁荣。㉓除前朝遗泽之外,宋代蜀籍文人自身的发展也不可忽视,宋代蜀籍文人数量为历代空前,跻身全国各地域第6位,㉔在历代横向对比中位列第一,形成了整个巴蜀文学史上的最高峰。

在蜀地本土文学的高度繁荣之下,入蜀文人的光芒丝毫未被掩盖。不同于唐代,宋代入蜀的文人大多以官员身份入蜀,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黄庭坚和陆游。两人在宋代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地位甚隆,且在蜀地留下了个人创作生涯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黄庭坚对蜀人影响甚大,所著《山谷集》在宋时有三位注者,均为蜀人,㉕陆游对黄庭坚也有明确的追慕创作。㉖此外,在宋代入蜀文人中,影响大的还有王十朋、张詠、赵抃、范成大、崔与之等,这些入蜀文人与蜀地文人间产生错综的勾连,构成宋代蜀中文学的有机整体。

宋代文人对于"入蜀"的认知,总体上源于他们对杜甫的关注。宋人在对杜甫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杜诗以"杜甫入夔州"为节点,创作风格上出现了明显变化。黄庭坚在《与王观复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个观点:"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㉗南宋时,孙奕也有类似的观点,并且提及了其他文人:"醉翁在夷陵后诗,涪翁到黔南后诗,比兴益明,用事益精,短章雅而伟,大篇豪而古。如少陵到夔州后诗,昌黎在潮阳后诗,愈见光焰。"㉘可见对于宋人而言,"杜甫入蜀"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它赋予了蜀地特别的文化意义。

源于对杜甫的热爱,宋人开始关注杜甫与蜀地

的精神关联，并在创作中逐渐将杜甫作为蜀地的一个文学意象与精神向导，比如王之望《帅漕复次韵再和》云："波澜已得江流助，组丽仍依锦段红。入蜀词人多妙句，向来严杜一编同。"楼钥《送王粹中教授入蜀》云："少陵入蜀往来久，须行万里方知诗。"尽管也强调蜀地风物对于诗歌的重要影响，所谓"入蜀词人多妙句"其关注点仍是落在杜甫作品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十朋的夔州诗。王十朋在入蜀之前就已是杜诗热情的推崇者，在他的2187首诗中，以杜甫为典的有74首，[29]模拟借鉴杜诗更是所在皆是。孝宗乾道二年(1166)，他前往夔州任知州，停留不到一年，总计留下372首诗作，其中直接提及杜甫的超过30首，且在入蜀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将自己的体验与杜甫进行比照，诗作中有多处对杜甫诗句的化用。[30]

除却以个人、群体为单位的文学交流，宋代文人的巴蜀诗创作还起到串联唐宋诗、揭示其发展流变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认为巴蜀诗能"承唐启宋"，是因为唐代的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刘禹锡、岑参、李商隐等文人与宋代的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文人，由于因缘际会，在蜀地发生了各种精神层面的交集。[31]苏轼的文学史地位之高，堪称北宋文人之最，黄庭坚则是宋代最重要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陆、范为"南宋四大家"，这些文人是宋代诗坛的领军人物。从继承的方面来看，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师法的对象，往往也是经典唐诗的代表，宋人在创作过程中对唐诗的摹写化用、转益多师，由此被凸显到极致。另一方面，宋代入蜀文人的官方身份，又促使他们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时代反思，普遍呈现出"中正平和、幽雅深沉"的审美特征，这同时也成为宋诗之于唐诗的最大变化。[32]由此可见，巴蜀作为宋代的文学高地，颇具风向标之作用，其变化消长乃成为全国文学发展变革的一个缩影。

(四)元明文人入蜀与"入蜀"吟咏的凝滞反思

元代是蜀地文学一个相对衰落期，战争是导致衰落的最大因素。南宋以来，蜀地丧失了长久以来的和平，成为了中原王朝抵御外族的前线。陆游是南宋入蜀文人中文学史地位最高的，他就曾亲赴前线，在诗中留下了"铁马秋风大散关"的不朽印记。[33]宋元之战以窝阔台攻蜀为开端，以钓鱼城陷落而落幕，历时四十四年，钓鱼城攻坚战甚至直接导致了当时大汗蒙哥的死亡。连年战乱之后，蜀地的人口和经济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缩减至南宋巅峰期的二十分之一，[34]作为文学传承载体的世家近乎湮灭，幸存者也大多流入北京、江南文化圈，"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来已尽矣"[35]。宋代保留的唐人遗泽，在战争中彻底毁灭。

此后的元朝国祚不长，这导致了蜀地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生存环境进一步破坏。都城变迁导致的政治版图变化是蜀地文学走向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汉唐定都长安，尽管蜀道难行，蜀地却依然在都城辐射范围内，相比江南，地理条件甚至略胜。每当政府对中原地区管控失利，便会转而经略蜀地，蜀地由此获得发展良机。有宋一代，国土安全受北方少数民族威胁，至南宋甚至退守长江，因而蜀地之重要性较前朝更甚，可谓衰世最大的受益者。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形成了以北京为政治中心，江南为经济中心的"双核"格局，蜀地远离东部核心城市，政治、经济地位都已难回巅峰。

元代蜀地严重受损的政治经济环境，导致了这一时期蜀地文学的衰颓，对于外籍文人的吸引力也严重下降。相关吟咏也并无特色，比如萨都剌《次韵送虞先生入蜀代祀》："扬马大邦文物盛，题诗须近草堂西"，再如另一位元诗大家马祖常的《送文璋甫入蜀省幕》："蜀国海棠红似锦，况在濯锦江水边。见君西去饮君酒，恨无成都卖卜钱"，吟咏大都是遵循文学史的传统。

如果说元朝时，在历史惯性下，入蜀还有汪元量这样的宋遗民，也有虞集这样的蜀籍大家，[36]到明代，情况更加严峻，蜀人杨慎曾在《与周子籲书》中写道：

> 常慨今天下士习，大不如古，盖道有升降，时则然。吾乡去宸极独远，文教之被，不及前代，地则然……国朝上轨汉唐，吾乡百七十年，士生其间，学犹未有定方，文犹未有定体也。[37]

此时已是明朝中叶，蜀地文学状况仍未有明显恢复，可见受损之深。尽管如此，明人依然对蜀地抱有亲近之意，如胡应麟《送人入蜀》："蜀中形胜堪怜汝，定把新诗吊薛涛"，这种好感不仅源于明人所能亲自体验的蜀地风物，而更多的来源于他们对于蜀

地辉煌历史的向往；明代文人与其说是被蜀地风物所吸引，不如说是被文学作品中的蜀地风物所吸引。此时的蜀地，经历了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开始变得意象化了，如柯潜《送试佥事陈君序》：

予少时每读李太白《蜀道难》，辄嗟愕以为人生得不入蜀为大幸也。及读左太冲《蜀都赋》，见其盛称蜀中山川人物，乃恨不得一往游焉。[38]

另一方面，随着蜀地的文学生态从唐宋的顶峰跌落，蜀人开始寻找自己的文脉与自尊，其他文人也开始缅怀蜀地曾经拥有的辉煌。文人论及蜀地，其心理状态悄然发生改变，“入蜀”吟咏的勃兴与溢美即由此开始。[39]明人开始在诗论中探究以杜甫为首的入蜀文人的创作经历，并通过杜甫等文人的蜀中创作来强调蜀地的重要性，在突出蜀地地位的同时，也为“杜甫入蜀”这一杜诗发展的节点赋予了空间意义：

夫国最西境，其山川雄深靓丽，即三峨甲于震旦，而其土大物丰，利尽西海，宜莫如蜀长卿渊云接轨，兴汉所为赋江汉之灵，世载其英者也。以至杜少陵羁旅乎？每往浣花东西屯濛间，而论者以其诗入蜀益工，蜀重可知矣。[40]

这在诗作中也多有表达，如陈琏《浣花草堂》：“欲知工部忠君志，好读当年入蜀诗。”苏平《送骆泰入蜀省兄》：“诸葛祠堂春草没，杜陵茅屋夕阳低。”胡应麟《李本宁廉访以武侯庙八律见贻倚赋排律四首》其一：“炎精垂烬夕，泪尽杜陵诗。”程敏政等《上元日与林谕德亨大商懋衡李世贤二侍讲饯同年陆叙州克深考绩西还联句》：“入蜀杜陵诗益壮”。张煌言《别陈齐莫》：“杜陵入蜀悲难去，枚叟游梁笑未归。”

明代的蜀地还诞生了两部文献学巨著，即《全蜀艺文志》与《蜀中广记》。前者汇集涉蜀文学作品六十四卷，后者则系统收录了蜀中山水、风物、人物等人文地理资料，唐世诗人入蜀说正出于此。《全蜀艺文志》由时任副按察使的江苏人周复俊主持、蜀人杨慎汇编，《蜀中广记》由福建人曹学佺所撰，这两部文献学著作得以成书，入蜀文人功不可没。[41]

总而言之，改朝换代的战乱对蜀地造成全方位的严峻打击，由此导致的文学衰败，直至封建时代结束，都没能获得唐代的超然地位。但在纯文学衰败的同时，“入蜀”吟咏作为一种观念层面的总结，在时间、人物上泛化，在地域上具体化，逐渐成为传播天下的通行语。

## 二、清代“自古文人多入蜀”说成型的时代背景及文人心态分析

清代的蜀地文学较明代而言，始终处于上升阶段，最终由清初战乱之低谷发展为清末之高峰，影响力延至民国。从清建国到雍正年间，蜀中处于漫长的恢复期，这一时期内，由于蜀籍人口锐减，清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入川行动，史称“湖广填四川”，这一移民举措促成了古代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被动性的文人入蜀，客观上促进了蜀中政治稳定与经济恢复。相比好享乐、偏世俗的巴蜀文化，这波移民文化更趋向于中原文化，强调科举立身、诗书传家的传统。入蜀移民形成的新家族主动投身科举与文教事业。[42]新家族的行动带动了蜀地文化的整体发展，继宋代之后，再一次造就了大批文学、官宦世家。经过数代人的发展，至清中叶，蜀地重新作为文学氛围浓厚的地域为时人所认可，所谓：“伏念巴蜀多才，人士得江山之气。”[43]清代蜀中书院文化极盛，经过长期积累，至清末达到高峰，形成先秦、西汉、两宋之后又一次蜀学热潮。[44]

正是到了清代，关于“文人多入蜀”的吟咏开始集中出现，比如康熙朝的林良铨写道：“自古文人多入蜀，西风又近杜陵秋”，李调元在乾隆二十九年写道：“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毕沅在乾隆三十二年写道：“自古诗人都入蜀，于今良会正中秋”，赵怀玉在嘉庆三年写道：“毕竟才人多入蜀，若逢守道话相思”，何绍基在咸丰五年写道：“诗人自古多游蜀，杰士于今半在边”，宝廷在同治七年写道：“从古诗人多入蜀，前有杜高后黄陆”，陈衍在光绪四年写道：“古来诗人每入蜀，少陵玉溪及放翁”，等等。就这些吟咏的内容而言，已经超越以往关于蜀地具体风物和人物的歌咏，明确作出了“自古诗人都入蜀”的判断，而这正是由一般性的“入蜀”吟咏发展为“自古文人多入蜀”观念的重大转折。

### (一)“文人多入蜀”说成型的相关文本考辨

检之典籍，据不完全统计，清人诗作中涉及“入蜀”吟咏的诗歌可得十七首，试将其作者、创作时间、相关诗句、背景情况等信息整理后，制《清诗中“入蜀”吟咏相关诗句一览表》如下：

**表1 清诗中“入蜀”吟咏相关诗句一览表**

| 诗题 | 作者 | 创作时间 | 相关诗句 | 背景 |
|---|---|---|---|---|
| 《题孙受亭司马闲情集后》[45] | 林良铨 | 约在康熙前中期 | 青莲诗圣非关酒，<br>太史才雄半在游。<br>自古文人多入蜀，<br>西风又近杜陵秋。 | |
| 《送郑慎人之成都三首》[46] | 王鸣盛 | 乾隆二十一年(1756) | 诗人游蜀有成例，<br>杜老涪翁与务观。 | 同年郑王臣(字慎人)入蜀。[47] |
| 《叠前韵送同年朱子颖入蜀》[48] | 程晋芳 | 乾隆二十九年(1764)[49] | 诗人例游蜀，<br>得句妙游刃。<br>杜叟放翁居，<br>菴扫花溪浚。 | 同年朱孝纯(字子颖)入蜀。[50] |
| 《送朱子颖孝纯之蜀作宰》[51] | 李调元 | 乾隆二十九年(1764) | 自古诗人例到蜀，<br>好将新句贮行囊。 | 同上 |
| 《申南屏停车图》[52] | 程晋芳 | 乾隆三十二年(1767) | 诗人例赴蜀，<br>匪特趋其名。<br>且作吏且游，<br>瘦笔扬高声。 | |
| 《集梦堂司农独往园为查俭堂太守题蜀图即送之官宁远》[53] | 毕沅 | 乾隆三十二年(1767) | 自古诗人都入蜀，<br>于今良会正中秋。<br>……<br>难得行踪随杜老，<br>剑州君去我秦州。 | 同年，查礼(俭堂)入蜀，赴任宁远知府。[54] |
| 《薛石先生癸卯岁归田里戊申刻诗集四十九卷成便寄一函来题其后》[55] | 永理 | 乾隆五十三年(1788) | 细雨骑驴回首梦，<br>诗人入蜀总能工。 | 约在乾隆五十五年(1780)，钱载(籜石)入蜀祭告岳渎，晚年刊刻诗集。 |
| 《送言八朝标出守夔州》[56] | 赵怀玉 | 嘉庆三年(1798) | 毕竟才人多入蜀，<br>若逢守道话相思。 | 同年言朝标出任夔州。[57] |
| 《汪绛人参军初从军图》[58] | 陈文述 | 乾隆五十八年(1793)—<br>嘉庆十二年(1807) | 诗人例入蜀，<br>秀才惯从军。<br>汪生抱仙骨，<br>吐气凌秋云。 | 汪初乾嘉时入蜀，<br>1808年死于蜀地。[59] |
| 《心知堂诗稿》题诗[60] | 宋鸣琦 | 约道光七年(1827) | 入蜀才人例有诗，<br>云天万叠境尤奇。 | |
| 《心知堂诗稿》题诗[61] | 毕华珍 | 约道光七年(1827) | 平生未穷蜀道难，<br>诵君新诗神凛然。<br>诗人入蜀才始放，<br>元气沃荡肠肚湔。 | |
| 《先姜坞编修考陆放翁乙卯年七十一诗，叙定放翁生于宣和七年乙巳十月十七日。莹以乾隆乙巳年十月初七生，道光乙巳年二月五日展少陵先生及放翁之祀于草堂有感》[62] | 姚莹 | 道光二十五年(1845) | 谁遣诗人多入蜀，<br>怅望萧条悲宋玉。 | 1843年，姚莹以同知州发四川用，同年因台湾事入狱，于1844年5月戴罪入蜀。[63] |
| 《去蜀入秦纪事书怀却寄蜀中士民三十二首并序》[64] | 何绍基 | 咸丰五年(1855)[65] | 诗人自古多游蜀，<br>杰士于今半在边。 | 咸丰二年(1852)，何绍基任四川学政，同年11月至蜀。 |
| 《送方子箴浚颐之蜀》[66] | 宝廷 | 同治七年(1868) | 从古诗人多入蜀，<br>前有杜高后黄陆。<br>名区不得名流诗，<br>山水萧条笑无福。<br>……<br>诗人入蜀山灵喜，<br>山川感触诗愈奇。<br>……<br>愿君努力多题诗，<br>休谓今人不如古。 | 同年，方浚颐调任四川按察使。[67] |
| 《晤芸敏闻兰生有蜀道之行书寄》[68] | 陈衍 | 光绪四年(1878)[69] | 古来诗人每入蜀，<br>少陵玉溪及放翁。 | 诗中兰生应指王景。[70] |
| 《春日偕雅亭弟入都谒选留别诸同好兼示雅亭》[71] | 陆文杰 | | 自昔才人多入蜀，<br>从来豪士爱游燕。 | 陆文杰，少时随宦蜀中。[72] |
| 《下里词送杨使君之蜀》[73] | 赵熙 | 宣统二年(1910) | 从古诗人多入蜀，<br>花潭杜老望君时。 | 宣统元年(1909)杨增荦以候补知府分发四川，但途中遇变故未成行。[74] |

这十七首诗由十六人所作，最早作于康熙年间，最晚作于辛亥革命前期，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作者中仅李调元、赵熙二人为蜀人，林良铨、宋鸣琦、姚莹、何绍基、陆文杰五人有入蜀经历，且姚、何、陆三人入蜀当在创作相关诗句之前。诗句中涉及了郑王臣、朱孝纯、查礼、钱载、言朝标、汪初、姚莹、何绍基、方浚颐、王景、陆文杰共计十一人的入蜀经历，以及孙受亭、汪仲洋的蜀中创作。通过对以上诗句创作时间的比对，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前后，由于程晋芳、李调元、毕沅等一批著名文人的吟咏和倡扬，“自古文人多入蜀”的观念已经基本成型，这是对唐韩愈以来各家关于文人与蜀地关系吟咏、论述的总结与升华，其中包含了时间维度、主体维度和价值维度，其传递的核心意涵在于：自古及今，由于蜀地人文之薮和前贤入蜀的感召，山水风物的吸引，历代文人之入蜀前后相继、绵绵不绝，最终实现了文人与蜀地的相互成就和共同发展。

这些诗句提及文人入蜀，主要体现出两种吟咏角度，这些角度虽非清人所开创，但与前人相比，有其独特性：

其一，作于特定文人入蜀之前，在饯别时表达对入蜀创作的期待，以上诗句中有八首表达类似意图。作者通过援引前朝文人入蜀的事例，或期待友人以前代文人为标杆，入蜀后积极创作；或将友人与前贤入蜀的相通引申为创作上的相通，借此表达对友人入蜀后创作成果的高度期待。比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朱孝纯入蜀，朱孝纯(字子颖，一字子颍)师事刘大櫆，与姚鼐、王文治等交好，为文坛名手，有多位好友赋诗送行。李调元赋《送朱子颖孝纯之蜀作宰》，诗云：“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同为刘大櫆弟子的程晋芳用《送商宝意太守之滇南》韵赋《叠前韵送同年朱子颍入蜀》，诗云：“诗人例游蜀，得句妙游刃”。皆予以鼓励与展望。同治七年(1868)，方浚颐调任四川按察使。宝廷作《送方子箴浚颐之蜀》，诗云“从古诗人多入蜀，前有杜高后黄陆。名区不得名流诗，山水萧条笑无福”，其中，作者的期许更为热切，所谓“诗人入蜀山灵喜，山川感触诗愈奇。愿君努力多题诗，休谓今人不如古”。

其二，在评价他人入蜀创作或蜀地相关的文艺作品时，将入蜀文人视为标杆，蜀地作为文人创作的源泉，将今人创作与前人同列，以表溢美之情。清人在列举入蜀文人时，不再像明代以前那样集中于以杜甫为首的唐代文人，更关注到陆游、黄庭坚等人的创作，将“文人入蜀”这一概念的时间跨度扩大。从文学价值上看，这些作品属于交际应酬之作，带有作者强烈主观意识，并不能客观反映被评价者的真实文学水平，但这类作品最能体现清人对“入蜀”吟咏的认可与理解。诗人不仅强调了“文人入蜀”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还致力于对这种关系的形成进行解读。

他们一方面从“文人流动”视角出发，强调文人主动漫游的意义，如林良铨在《题孙受亭司马闲情集后》中有“青莲诗圣非关酒，太史才雄半在游”句，将李白的文学成就与司马迁的史学造诣归功于二者漫游全国的经历。文人自身行迹的变动，促使他见证陌生的景物，获取全新的人生体验，两者共鸣，自然为文学创作注入新血，达成“即景契心得”“旧句入新图”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刘勰“江山之助”理论的继承与阐发，“入蜀才人例有诗，云天万叠境尤奇”，“诗人入蜀山林喜，山川感召诗愈奇”，强调地方山水与文学创作相互成就、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也体现出清人将名人名诗视为构成蜀地文学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我们将清代认定为“文人多入蜀”吟咏的定型期，在于清诗中对于“文人入蜀”一事的表达相比前代出现了几个特点：首先，清人对蜀地概念及“入蜀”行为的认知空前乐观、积极；其次，清人对“入蜀文人”的梳理较前代更具备全时代、全地域倾向；最后，清人试图将“文人入蜀”这一现象加以规律化、理论化，并积极在文学作品中进行强调与传播。

(二)“文人多入蜀”说成型的文人心态分析

自从“文人多入蜀”说逐渐成型之后，它就不再是纯粹的文人流动事件，而是清人基于自身蜀地观念，对于“文人入蜀”的群体认知，这一认知以文学作品为载体而广泛传播。

根据在“文人入蜀”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可将参

与这一群体认知构建与传播的文人分为三类，即蜀籍文人、入蜀文人及不涉蜀文人。这三类人对蜀地的认知有所区别，因而在“入蜀”说成型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首先是蜀籍文人。前文所叙十七句诗中，有两首作者为蜀人，分别是生活在清中期的李调元与生活在清末的赵熙。两人所作都是送别诗，均通过铺排蜀中风物、标榜前贤创作，从而向即将入蜀的友人构建一种“入蜀必然创作，创作必然卓越”的预设。蜀籍文人是“入蜀”说最坚定的信奉者与传播者。

蜀籍文人正式参与“入蜀”说的定型与传播，以宋末以来蜀中文学衰落为转折点，在蜀中文学达到两宋时期巅峰状态之后，这一漫长的低谷期对蜀人形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正如元诗四家之一、祖籍四川的虞集在《葛生新采蜀诗序》中所言：

> 吾蜀文学之盛，自先汉至于唐宋，备载简册，家传人诵，不可泯灭。宋南渡以来，蜀在斗绝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盖相望；礼乐文物之懿、德行学问之成，立功立言，卓荦亨畅；下至才艺器物之类，其见诸文辞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丧乱以还，废轶殆尽！[75]

在清代蜀地恢复生息的同时，蜀人从未放弃对蜀中文化传承的保护与发扬。康熙四十三年(1704)，锦江书院设立，正处于宋末被毁的文翁石室旧址上，这是蜀人强化蜀学传承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蜀籍文人始终致力于对蜀地学术与文学的发扬。其中，李调元对蜀中文风复兴的强烈意志与卓绝贡献尤为突出。他不仅积极投身文学创作，所留下大量歌咏家乡的诗文，至今被学界认为是其诗歌的最具价值之作，同时针对当时原始形态的川剧进行演出、创作、教习与研究，全方位地参与到蜀地乡邦文学的发扬中。[76]学术上，他与父亲李化楠、同辈学者彭端淑等人广罗全国典籍，抢救蜀人著述，编纂了清代四川规模最大的私刻丛书《函海》。此书“书成分三十函，自第一至十，皆刻自晋而下以至唐宋明诸人未见书，自十一至十六，皆专刻明升庵(杨慎)未见书，自十七至三十，则附以拙刻”[77]，目的明确，在编纂之时便以接续前人、查补佚文为己任，可见其维护蜀地乡邦文献之功。在蜀籍文人的不懈努力之下，清代蜀中学术传承始终未断绝，并在道、咸之后，再次爆发蓬勃的生命力，涌现出大批学者，他们摒弃八股陋习，追求对儒家经典及新兴西学的研究，最终在清末民初达成了蜀学的最后一个高峰。[78]

蜀中文人的送别诗对入蜀文人极力宣扬文人入蜀的光辉历史，既是对友人的安抚与勉励，更是一种自勉乃至自耀。在此过程中，蜀人对于阐释和宣扬“入蜀”说的积极性首次超越了外乡人。他们通过对“入蜀”说的宣扬，强化蜀地对于入蜀文人的吸引力及独特作用，构建前代“文人创作”与“入蜀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入蜀”仿佛成了成长为杰出文人的先决条件。“入蜀”说从此具备了某种心理暗示功能，成为针对入蜀文人最好的心灵抚慰剂。

再就是入蜀文人。与唐人不同，清代入蜀文人所面对的蜀地，已经历了千年以上的文学资源开发与吟咏。因此，清人入蜀的过程，是一个通过自身探索，对心理预设进行印证与祛魅的过程。在亲身确认了蜀地的独特魅力之后，他们或受新景物的感召，或对文史遗迹产生共鸣，常能突破以往的文学风格，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成就又能进一步印证“入蜀”吟咏的预言性。在“入蜀”吟咏的定型过程中，清代入蜀文人扮演了实践者与传播者的角色，是这一群体观念得以流传全国的主要媒介。

以前文中李调元送别的朱孝纯为例。在入蜀之前，朱孝纯对于蜀地的认知主要集中在蜀地的闭塞与险僻上，他在留给家人的诗作《留别诸弟昆》中毫不掩饰对入蜀之行的担忧：

> 天外西风玉垒深，旅鸿何日达乡音。
> 三年霜雨邱园泪，八口饥寒骨肉心。
> 鼎食无因供禄养，边民倘解重儒矜。
> 牛头十五年前梦，忍向遗篇觅旧吟。[79]

此时蜀道交通状况相比唐宋已有所改善，朱孝纯所畏惧的不再是蜀道本身的艰险，而是入蜀之后的孤独与生活困窘。入蜀之后，蜀地不再是遥远陌生的特殊地域，而是日常生活审美的一部分。秦蜀道上的奇异风景与自身经历的心得体悟不断影响着朱孝纯的创作心态，促使他留下了一系列山水、怀古

作品。王昶称其涉蜀诗文“豪宕雄骏,取材也富,而宗法也高,生平抑塞磊落之意,毕具篇什,卒未尝少诡于法”,并认为他“顾嗜释氏之说,尝独往大峨绝顶观所为菩萨光者;今以谢事闲居,乃跃马仗剑,出岷山外千余里,览壁垒战斗之状,以发皇其志气”,[80]拈示出朱孝纯文风中雄奇豪壮的一面,可与蜀中风物相呼应。

实际上,雄奇使气是朱孝纯诗文一贯的风格,刘大櫆与姚鼐分别在他的诗集序中如此评价:

子颍奇男子也。其胸中浩浩焉常有担荷一世之心,文辞章句非其所措意,而其为诗古文乃能高出昔贤之上……其自秦入蜀,道途览古之篇,尤为深入唐人之室。[81]

今世诗人,足称雄才者,其辽东朱子颍乎?即之而光升焉,诵之而声闳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气勃然动乎纸上而不可御焉,味之而奇思异趣角立而横出焉,其惟吾子颍之诗乎?[82]

由此可见,入蜀文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并不是一种突变,而是自身文学素养与蜀中自然人文相互作用后的继续发展。蜀地对于入蜀文人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所蕴含的独特美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突破原有风格、进行自我深化的试炼场。

还有就是不涉蜀文人。在“入蜀”吟咏的定型与传播过程中,还有许多不曾入蜀的外籍文人参与,他们与蜀籍文人、入蜀文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心中同样存有对蜀地文学生态的预设,并通过对友人文学创作状况的观察,主动接受了“入蜀”吟咏的核心思想,成为这一观念的接受者与次级传播者。“入蜀”吟咏正是在以上三类文人群体的传播中不断强化,流传至今。

### 三、促成“文人多入蜀”观念的动力机制

历代文人入蜀,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方力量此消彼长,导致了入蜀现象盛衰交替。不同时代文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入蜀的主要驱动力也有所区别。概括而言,“文人入蜀”之所以会大规模出现,“自古文人多入蜀”说之所以为世所公认,主要是一种以时局推动和物产吸引为外在驱动、以前贤感召和山水熏染为内在驱动的动力机制在起作用。

外部动力最主要的是政治局势推动。正如前文所言,历代文人的入蜀行为多半与政治局势有关。一方面,蜀地因其远离中央、环境闭锁的特征,向来是世人认知中有名的“蛮荒之地”,是宋前文人官员贬谪的主要去向之一。[83]另一方面,则源于蜀地的重要战略意义,尤其在南宋以后,随着政治中心东移,蜀地不仅物产丰沛,还被赋予镇抚西南的政治、军事作用,政府不仅需要借助蜀地官员稳定西南少数民族状况,还需要防备蜀地因相对远离中央而可能出现的割据,因而更倾向于派遣忠诚而富有才干的士人入蜀为官。以此为前提,国家遣官入蜀日益增多,许多文人都是以此为契机而踏入蜀道。

文人“被迫入蜀”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中原地区周期性的战乱。蜀地在中国的历代版图上,历来扮演了“避风港”的角色。每当中原失序,文人为了生存,便会远走边地,以避战乱。蜀地因其固有的优越条件与战略意义,甚至能吸引中央朝廷在此落脚(如安史之乱玄宗幸蜀),文人自然趋之若鹜。

五代时期避乱文人在蜀中最大的文学成就,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流派——花间派的诞生。《花间集》所涉文人共19人,全集收词500首。其中明确为蜀籍文人6人,创作词作158首,人数及作品数分别占全集的约31%、32%;明确为入蜀文人7人,创作词作227首,人数及作品数分别占全集的约36%、45%。流派中最重要的词人温庭筠和韦庄也都是入蜀文人。无论从创作数量还是影响力来看,入蜀文人都在蜀中文学圈占据了重要地位。由此可知,《花间集》不仅来自蜀人,而是蜀人与外籍文人联手打造的经典文学汇编,入蜀文人对于乱世的负面情绪与巴蜀文化好享乐、重刺激的特质结合,形成了《花间集》绮艳幽怨的词风,进而奠定了词体的基调。[84]

宋代及以前,蜀地之于入蜀文人,原本是一个特殊的“暴风眼”,入蜀文人大多历经坎坷,在蜀地相对安定的生活与文化环境中完成了优劣逆转,蜀地成

了一些文人舔舐心灵创伤、总结反思的“文化熔炉”，由此促成了文人入蜀笔力精进、文风大变的现象，[85]此亦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入蜀文人或出于乡愁，或出于个人理想，在诸事安定之后多半离开蜀地，分赴四方，这又促成了蜀地文学的外流。在这些著名文人的影响下，更多文人被吸引着主动投身蜀地，追求前贤胜迹，追求自身突破。文人入蜀从被动的远放行为，逐步转换为具有一定自主色彩的追慕踏访，从而形成了“入蜀”吟咏背后独特的文化循环机制。

物质条件的吸引也是重要的客观因素。“文人入蜀”现象之所以令人瞩目，蜀地之所以能长期成为文人投身的场所，要归功于其自汉代以来延续至清末的重要战略意义与优越物质条件，这是文人在蜀地得以长期留驻的物质基础。

蜀地凭借丰沛的自然及人文资源，早在先秦便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源源不断地为中原地区提供资源、人才与安全方面的支持。而且地理位置特殊，不容易被外界的时局动荡影响，多年以来为入蜀文人提供了稳定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对此，历代文史学者早有共识，不再赘述。

内在驱动力中最重要的是前贤感召。前代的蜀籍、入蜀文人为这片土地留下的文学遗产经过数百年的发酵，逐渐焕发出自身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直接作用于文人的精神世界，促使他们自发地为追慕蜀地人文而进行相关创作。

宋代以后，杜甫成为大量文人追慕的诗坛巨子，宋诗摹杜，乃至以杜甫、杜诗入典，已成为诗坛主流。《杜工部集后记》中记录了时人对杜甫的狂热：

> 近世学者，争言杜诗，爱之深者，至剽掠句语，迨所用险字而模画之，沛然自以绝洪流而穷深源矣。又人人购其亡逸，多或百余篇，少数十句，藏去矜大，复自以为有得。[86]

即使宋代之后，虽有起伏，杜甫对于诗坛的影响力也并未消退，直至清末民国。在杜甫传世的1100余首诗歌中，于蜀中创作的超过800首，在文人对杜甫的普遍推崇之下，文人在蜀中自发追寻杜甫的遗迹、作品甚至人格风范，并在杜甫的影响下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87]甚至可以说，“入蜀”吟咏之所以能从一类现象发展为一种观念，历代文人对于杜甫蜀中创作的不断学习、解读与再创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南宋时，陆游受夔州通判一职，由故乡山阴入蜀，在蜀地逗留八年，这期间，他对杜甫的蜀中遗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深入探访与记录。他在入蜀过程中，创作了《入蜀记》，文中详细记录了入蜀一百五十七天的沿途见闻，不仅表达了对杜甫等先贤的缅怀，更对先贤在蜀中的活动与创作进行考证。他考证出了杜甫在夔州时期“公安—沙门—白帝城—瞿塘”的活动路线，明确了杜甫每次行旅的具体时间，并将杜诗中涉及的地名、景物与南宋时的地理一一对应。入蜀之后，陆游不仅在最初赴任的夔州详尽考证了杜甫东屯故居的情况，还记录了杜甫瀼西旧祠，以及巫山县所留存的黄庭坚寻访杜甫遗踪的痕迹，这两处遗迹现已不存，却依靠文献记载得以保留。此后，陆游还拜谒了位于成都的杜甫草堂，并记录了蜀人每年四月十九日在杜甫草堂附近开展的“浣花节”活动盛况。此后，他还辗转阆中、绵州、忠州、南郑、剑阁等地，寻访杜诗中提及的种种风物。[88]这段经历给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离蜀多年后，仍念念不忘那段“我思杜陵叟，处处有遗踪。锦里瞻祠柏，绵州吊海棕”的岁月。[89]

陆游在寓蜀期间的“山程水驿”[90]中，形成了一生诗歌创作数量与质量的高峰期，在与先贤的充分神交与对蜀中风物的深度解读中，完成了自身诗学理论的完善以及创作实践的深入。[91]他不仅充分理解并吸收了杜诗中爱国忧民的深湛之思，也感悟接受了杜甫所忽略的蜀中山水之雄阔，表现出更为包容与阔大的诗境。[92]杨万里在《跋务观剑南诗稿》中就特别注意到这一点：“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鬼啸狨啼巴峡雨，花红玉白剑南春。”[93]陆游的蜀中诗作更反过来影响了他所寻访吟咏的先贤的后世形象。他最终成为后世解读杜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4]

总而言之，在历代文人出入蜀地的过程中，文人

得以在同一空间内与同代杰出文人以及前代贤哲产生文学、精神上的交流。当他们亲历同样的山水风物，面对相似的命运，忧虑同样危难的天下局势，便不免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入蜀文人吟咏先辈时，不仅他们的创作受到了前贤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同样反哺了前贤，丰富了前贤作品的内涵，扩大了前贤的文学影响力。

山水感召是又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除了政治环境、安全状况和人员流动等受外部条件干扰的因素外，蜀地自身的自然条件也是文人入蜀的重要诱因之一。这一因素的影响力，随着蜀地与外界互动的便捷化与涉蜀诗的外流而逐步攀升。

入蜀文人对于蜀中山水、风物、民俗的亲临描摹，是本地文人与依据想象展开创作的文人所不可比拟的。入蜀文人对蜀地的认知明显不同于生于兹长于兹、几近熟视无睹的本地蜀人。入蜀之后，只存在于案头纸上的奇山异水在这些文人眼前活跃起来，与原有的审美经验碰撞，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更重要的是，长久以来附着在山水景物上的诗心诗魂渐被唤醒，时空融通，意象熔铸，优秀的作品往往因此而生。

除自然景观之外，文人历代累积中的游览与创作，参与建构了蜀地丰富的名胜古迹，一些自然景观在此过程中逐渐意象化，凝结为某种人文景观。入蜀文人对于这些人文景观的书写，同样具备世代累积的特征及创作和接受上的循环结构。也就是说，蜀中风物通过文人的集中吟咏而形成意象，而这些蜀中风物意象，又通过一代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传布全国。这些作品对于宣传蜀中文化、改变外人对蜀地的认知，乃至促成可能的下一波入蜀都有重要的意义。

综合以上多重动力，“文人多入蜀”吟咏的核心，在一“入”字。蜀地不同于一般自然人文景观，仅通过远观、想象并不能产生独特的创作催生效果，蜀地对于入蜀文人而言，关键在于其独特的涵育机制，在于为创作者构建了一个“精神磁场”，唯有亲临实境，才能产生真正的“入蜀文学”。

“文人多入蜀”说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于蜀地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召唤性。这是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早期需要客观因素的促成，如前文提出的“时局推动”与“物质吸引”，但在蜀地文学繁荣到一定程度之后，山水风物便与文化遗迹、文教体系相融合，入蜀文学机制逐渐内化，蜀地的文学底蕴经过内外融通之后，不断被传承激发。就此而论，“入蜀”吟咏既是蜀地召唤性之“果”，又是召唤性之“因”。

“文人多入蜀”说成立的核心，则在于蜀地影响文学创作的浸润性。文人入蜀之后的创作成就，并不是一种突变，而是一种成长，是文人已有创作才华的超常发育。简而言之，文人入蜀之后，创作上的变化并非朝特定的方向趋同，而是沿着各自既有的道路升华。蜀地只不过为文人提供了一个自我总结、反思、蜕变的时空契机，文人变化的创作风格依然以自身意志为导向，这使得入蜀文学始终呈现为个性与多元并存的发展趋势。入蜀文学这一概念，更近似于一个文学生态圈，而非具有特定风格指向的流派。[95]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蜀地文学生态的独特性。相较而言，蜀地的召唤性与浸润性与其他地域相比，皆难言特异，但它们相辅相成，最终成就了“文人多入蜀”这一通行观念。有研究者就曾提出疑问，为何在入蜀吟咏流传的同时，比蜀地吸引力更大、文学创作更繁荣的京畿、江南并未产生类似的文学现象，没有产生“自古文人多入京”，“自古文人皆游南”的说法。[96]在笔者看来，乃因为这两地区对于文人的召唤与浸润的形式与蜀地有明显的不同。

任何时代，首都的召唤性必然是绝对化和压倒式的，这是古代文人与士大夫身份重合的现实所决定的。但是，这也导致了文人入京时，政治诉求压倒文学追求，首都文化的浸润性难以作用于文学创作上，缺乏自我总结、自我反思的精神需求，因而难以触发创作上的突变。从历史角度看，各朝各代的首都文化流动性很强，京城并非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导致其对应的文化缺乏稳定性，浸润性往往难以长久维系。

江南地区的情况则更为特殊，若论召唤性与浸润性，江南地区同样存在。蜀地所拥有的山水风物、文化传统方面的诸多特色，甚至北人三次南迁的心路历程等等，无不同样映照于江南地区。两地在文化形象上似乎多有相似之处。然而，至少在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文化交流的频繁程度，自身风格特征的稳定性等方面，两地的不同又是明显的。江南文学与文化得以兴起，乃是“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等文化中心三次南迁所促成的，所谓江南文化乃是江南风物环境与南下的中原文化结合的成果，甚至可称为“中原文化的江南化”。随着第三次南迁的完成，江南文化终于确立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并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风格特质。异质文学入江南，便成为“江南化”的异质文学，而不易发生自我蜕变与超常发育，使得“下江南”很难成为文人创作的转折点，可以说，江南地区的召唤性被其文学特质稀释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江南对文人创作的意义时，多称“才子出江南”，更关注江南对于本区域作家作品的孕育作用。

相比之下，蜀地在召唤性上不具备先天优势，虽以深厚的史学传统与多家糅杂的思想文化立身，文化底蕴上具备了强大的召唤性，但因与中原路径不通、交流不畅，文学发育常年较外界迟缓，且不为主流文人所知，再加上交通状况的恶劣，以至于一直作为荒僻险地和贬谪之所。但通过历代蜀籍文人与入蜀文人的共同改造，蜀地的精神磁场逐步形成，这一过程中，入蜀交通不断发展，蜀地召唤性随之增强。等到明清以后，当蜀地进一步融入全国文学，地域特征有所减弱时，“入蜀”观念及其文人流动机制已然成型，也就不再受地理条件支配了。

## 结语

在我们与梅新林教授倡导的文学地理学体系中，文学地理研究可分为四类，即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接受地理。文学地理学之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探索，实现研究对象的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⑰]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提出了著名的“江山之助”说，后者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意蕴的文学地理学命题，也由此成为后世文人评论文学创作与自然环境问题的通论。那么，如何将此命题转化为有价值的具体论题呢？显然，“入蜀”吟咏在论题的学理纵深感和具体的时空维度上极大充实和拓展了这一理论的学术内涵。“自古文人多入蜀”至少涵盖了两个论题领域：“自古”是文学史层面的概念，是自古以来的江山，强调文人入蜀现象历史跨度之广；“入蜀”是文学地理层面的概念，指出历代文人流动的一个趋向，此江山聚焦的是蜀地的江山。“入蜀”说不是单纯的文人流动问题，而是为何不约而同向特定地域流动的问题，涉及了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接受地理的一个系统性整合，是不同层面的地理如何助益文学的论题，实质上完成了外在与内在、地理与文学、自然环境与文人心性的一种联通，是对“江山之助”说的深度阐释和提升拓展。

概言之，“自古文人多入蜀”之吟咏及观念，作为文学地理研究中颇具样本意义的个案，它生动展示文学与地理互动的层次感、精细度与复杂性，有助于研究者从案例到原理，从具体到一般，来分析和推演文学地理自身具有学科特色的结构论、发展论和体系论，从而为更广阔地域、更丰富层次的文学地理观念的探讨提供富有启示的阐释框架和学术路径。

---

**注释：**

①当下直接以“文人入蜀”为题的研究不多，张仲裁的《“自古诗人皆入蜀”小考》(《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初步梳理了唐以来至清代的部分“文人入蜀”相关诗句，认为“自古诗人皆入蜀”这一说法源于李调元与赵熙的诗作，文章肯定了“文人入蜀”研究对巴蜀文学史研究的积极意义，但对“文人入蜀”相关文本的梳理不够全面，分析亦不甚充分。伍联群的《试论历史上的文人入蜀现象》(《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则偏重于对文人入蜀现象的研究，初步归纳了文人入蜀的主要原因与创作成就，视角较为宏观，但对入蜀文人的创作心态和游历动力缺乏分析。

②③④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

《史记》卷5《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200、207、316页。

⑤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30《艺文志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741页。

⑥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第2349页。

⑦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89《循吏传第五十九》,第3625—3627页。

⑧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45页。

⑨傅云龙、吴可主编:《唐宋明清文集:宋人文集卷3》,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34页。

⑩杨世明主编:《巴蜀文学史》,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37页。

⑪目前已有多篇论文提及这一问题,如胡阿祥:《论魏晋时期巴蜀地区本土文学的寂寥》,《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戴智恒:《三国蜀汉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魏红翎:《魏晋南北朝巴蜀文学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⑫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

⑬⑭严正道:《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15—24页。

⑮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9—92页。

⑯陈志平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306—307页。

⑰何林天校注:《重订新校王子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8页。

⑱林静:《四杰入蜀后诗风与初唐诗坛复古潮流的发生》,《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⑲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78页。

⑳严正道:《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文化研究》,第15—34页。

㉑杨世明主编:《巴蜀文学史》,第214—221页。

㉒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第74—93页。

㉓严正道:《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文化研究》,第242页。

㉔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

㉕黄庭坚《山谷集》有宋代三家注本,分别是任渊《内集诗注》,史容《外集诗注》、史季温《别集诗注》,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山谷集诗注提要》记载:"(任)渊,字子渊,蜀之新津人……(史)容,字公仪,号梦室居士,青衣(今属四川眉山青神县)人……其孙季温,字子威……",可知三位皆为蜀人。

㉖申东城:《巴蜀诗人与唐宋诗词流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9页。

㉗陈伯海:《历代唐诗论评选》,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4页。

㉘侯体健、况正兵点校:《履斋示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66页。

㉙使用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宋诗分析系统"(http://202.106.125.44:8082/song/),经关键词检索,得"杜甫"2次、"少陵"39次、"工部"1次、"子美"8次、"老杜"4次、"杜陵"20次。

㉚周晓娟:《王十朋夔州诗用典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㉛申东城:《巴蜀诗人与唐宋诗词流变研究》,第132—139、180、246—250、289—290页。

㉜伍联群:《北宋文人入蜀诗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5页。

㉝马寅:《陆游入蜀(乾道六年—淳熙五年)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㉞㊱杨世明主编:《巴蜀文学史》,第361—363、368—379页。

㉟贾大全、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卷5,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㊲王文才、万光治主编:《杨升庵丛书》卷4,北京:天地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㊳柯潜:《竹岩集》卷7《送试佥事陈君序》,清雍正十一年(1733)柯潮刻本。

㊴张仲裁:《"自古诗人皆入蜀"小考》,《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㊵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28《蒲西草序》,明天启三年(1623)玄白堂刻本。

㊶杨世明主编:《巴蜀文学史》,第421—426页。

㊷黄梅:《"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的历史考察》,《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㊸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1《授四川学政谢折》,清光绪刻本。

㊹舒大刚:《蜀学的流变及其基本特征》,《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㊺林良铨:《林睡庐诗选》卷上《题孙受亭司马闲情集后》,清乾隆二十年(1755)詠春堂刻本。

㊻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12《送郑慎人之成都三首》,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㊼蔡小燕:《郑王臣及其著述略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㊽㊾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16《叠前韵送同年朱子颍入蜀》,清嘉庆二十三年(1808)邓廷桢刻本。

㊿叶当前:《桐城派前期作家朱孝纯的生平与交游》,《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51)李调元:《童山集》卷7《送朱子颖孝纯之蜀作宰》,清乾隆刻函海道光五年(1825)增修本。

(52)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20《申南屏停车图》,清嘉庆二十三年(1808)邓廷桢刻本。

(53)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20《听雨楼存稿·集梦堂司农独往园为查俭堂太守题蜀图即送之官宁远》,清嘉庆四年(1799)经训堂刻本。

(54)王小恒:《论清代诗人查俭堂的入蜀缘起及其巴蜀诗歌创作》,《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55)永瑆:《诒晋斋集》卷4《薛石先生癸卯岁归田里戊申刻诗集四十九卷成便寄一函来题其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

(56)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卷17《送言八朝标出守夔州》,道光元年(1821)刻本。

(57)参见洪亮吉:《卷施阁集》卷20,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中有《法源寺看花即送言八朝标至夔州任》一首,创作时间由作者自注推知。

(58)陈文述:《颐道堂集诗选》卷15《汪绛人参军初从军图》,清嘉庆十二年(1816)刻道光增修本。

(59)许宗彦:《汪绛人小传》,《鉴止水斋集》卷17,清嘉庆二十四年德清许氏家刻本,第14—16页。文中明确提及汪初去世时间。

(60)宋鸣琦:《心知堂诗稿》题诗,汪仲洋撰:《心知堂诗稿》,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

(61)毕华珍:《心知堂诗稿》题诗,汪仲洋撰:《心知堂诗稿》,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

(62)姚莹:《后湘诗集》续集卷4《先姜坞编修考陆放翁乙卯年七十一诗,叙定放翁生于宣和七年乙巳十月十七日。莹以乾隆乙巳年十月初七生,道光乙巳年二月五日展少陵先生及放翁之祀于草堂有感》,清同治六年(1867)姚浚昌安福县署刻中复堂全集本。

(63)施立业:《姚莹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311—314页。

(64)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16《去蜀入秦纪事书怀却寄蜀中士民三十二首并序》,清同治六年(1867)长沙无园刻本。

(65)诗前有序:"咸丰二年三月服阕……八月初六简放四川学政……九月出都,十一月抵蜀……得七言律三十二首,因风寄与俾士民,知我之不能忘蜀人,犹蜀人之不能忘我也。咸丰五年,岁在乙卯,十月廿一日",由此推知。

(66)宝廷:《偶斋诗草》外次集卷5《送方子箴浚颐之蜀》,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方家澍刻本。

(67)王先谦、朱寿鹏:《东华续录(光绪朝)》,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本。

(68)陈衍:《石遗室诗集》卷1《晤芸敏闻兰生有蜀道之行书寄》,清刻本。

(69)创作时间由作者自注推知。

(70)徐世昌撰:《晚晴簃诗汇》卷177,民国退耕堂刻本。清代见于古籍,名、字或号为"兰生"的仅二人,其中王景为侯官人,光绪辛卯年举人,籍贯、生活时间与陈琇莹(芸敏)可对应,且书中录有其《谒工部瀼西草堂》二首,草堂在夔州,可推知其曾入蜀,故有此结论。

(71)徐世昌撰:《晚晴簃诗汇》卷122《春日偕雅亭弟入都谒选留别诸同好兼示雅亭》,民国退耕堂刻本。

(72)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25,清光绪刻本。

(73)王仲镛主编:《赵熙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8页。

(74)张发奋:《近代宋诗派诗人杨增荦诗歌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75)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1《葛生新采蜀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6)李调元:《函海·苏氏演义序》,光绪七年(1881)钟登甲乐道斋刻本。

(7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8)舒大刚:《蜀学的流变及其基本特征》,《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79)朱孝纯撰:《海愚诗钞》卷7,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9页。

(80)王昶:《春融堂集》卷31,清嘉庆十二年(1807)塾南书舍刻本。

(81)刘大櫆:《刘大櫆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64页。

(82)姚鼐:《海愚诗钞序》,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8册,第203页。

(83)据尚永亮研究统计,初唐时期,唐朝各地贬官人次较多的,北方主要为河南道和河东道,分别为36人次和35人次,南方则主要是岭南道和剑南道分别为163人次和58人次,可知

蜀地在初唐已成为主要的贬谪地之一(参见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页)。又据《舆地纪胜》和《唐刺史考》的相关记载,可知唐代剑南和山南部分地区(唐代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的部分地区亦属蜀地)刺史等级的贬谪官员有72人,直接由朝中贬谪至该地区的刺史亦近20人(参见肖占鹏、邓婷:《唐代音乐与文学》,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70页)。

㉞陈明:《〈花间集〉与巴蜀文化》,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㉟可参见申东城《巴蜀诗人与唐宋诗词流变研究》中关于卢照邻、杜甫、白居易、黄庭坚的论述,或直接点明,或通过对诗人的创作历程分析,都表明其入蜀后心理状态有所恢复,在经历了短暂的低谷期(如黄庭坚黔州时期)后,创作增多,且逐步完成风格上的融通和转变。可见蜀中时期是许多入蜀文人自身风格蜕变的重要时期。

㊱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41页。

㊲彭敏:《论杜甫及其蜀中诗歌创作对巴蜀文化的影响》,《名作欣赏》2015年第24期。

㊳㊴董利伟:《学杜在诗外——从陆游追蹑杜甫遗踪说起》,《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3期。

㊴㊵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382、3021页。

㊶康忠强:《从〈入蜀记〉看陆游入蜀的诗学意义》,《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㊷常珺:《杜甫与陆游夔州诗比较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㊸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21页。

㊺入蜀文人对于已有的涉蜀文学,不仅虚心学习借鉴,也会产生强烈的竞争意识与补阙意识。“杜甫不赋海棠”的例子就颇具代表性。杜甫涉蜀诗421首,咏蜀地风物66种,却不见蜀地代表性花卉——海棠。有宋以来的阐释包括:情绪偏差、未见海棠、笔力不济、避母讳、唐世不重海棠、流佚说,等等,甚至强行在杜诗中搜寻海棠的影子。这种讨论造成的另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激发了宋人强烈的海棠诗创作欲望,吟咏纷纷,以补杜诗之阙。相关论述可见于:严正道:《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文化研究》,第196页;沈扬:《经典缺失的诠释与补亡——论宋人对“杜甫不赋海棠”的讨论与书写》,《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

㊻张仲裁:《“自古诗人皆入蜀”小考》,《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㊼相关理论阐释可参见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05—446页。

## "Ancient Literati Entering Shu Commonly": The Formation of A Literary Geography Concept

**Ge Yonghai Shen Wen**

**Abstract**: As the saying goes, "ancient literati entering Shu(蜀)commonl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existed a long period and large-scale phenomenon of literati entering Shu, which produced many "entering Shu" chant. Based on the accumulation, sedimen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these chant through the ages, the inner spiritu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iterati and Shu was constantly emphasized and revealed,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recognized concept of "ancient literati entering Shu commonly". Its main purpose is that the trip to Shu influenced the landscape and spiritual guidance of the literati's creation and stressed the continuity of The Times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literati group.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this concept is a dynamic mechanism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As a typical literary geograph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i entering Shu commonly" provides an illuminating framework and academic path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literary geography theory.

**Key words**: "ancient literati entering Shu commonly"; literary geography concept; formation mechanism